

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

战火中的文学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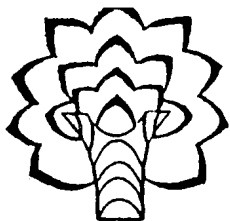
吴野 著



· 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 ·

战火中的文学沉思

吴 野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苑容宏

封面设计：邱云松

战火中的文学沉思

吴野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攀枝花新华印刷厂排版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7.875 插页4 字数170 千

1990年12月第一版

199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70 册

JSBN 7—5408—1350—4/I·4

定价：3.42 元

●目 录

绪论：非常时空下的特殊位置……………（ 1 ）

上 编

第一章 文学观念的调整与碰撞……………（ 13 ）

第二章 文学审美意识的强化……………（ 36 ）

第三章 文学价值取向的摇摆与偏移……………（ 62 ）

第四章 小说的期待……………（ 84 ）

第五章 歧见纷纭的论辩……………（ 105 ）

第六章 战争中的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
的战争……………（ 130 ）

下 编

第七章 万里来归，支持南天……………（ 157 ）

第八章 抗战文学创作的良师与诤友……………（ 176 ）

第九章 垦殖者的汗珠永远在土层中
闪烁……………（ 192 ）

第 十 章	对新美学观点的执着追求·····	(211)
第十一章	一滴滚烫的熔岩·····	(224)
后 记	·····	(246)

绪论：非常时空下的特殊位置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90年，时光已经流逝了将近半个世纪。四五十年来，我们这个喧嚣骚动的地球上，虽然还存在着流血的战争，不时可以听到枪炮的轰鸣，但毕竟还没有再度爆发全球性的战争。那一次世界大战，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已经被载入历史教科书，被“存入”了档案馆和各类军事历史博物馆。但是，作为曾经改变了亿万人的命运，改变了世界面貌的一段历史，它却以神奇的力量，顽强地渗入了在它结束以后才展开的现实生活的进程之中。在物质层面，它留给我们的，可能是弹坑与废墟，白骨与坟墓。但在精神层面，它留给我们的东西，却可能要丰富、复杂得多。不断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历史时期的精神文化活动，领悟蕴涵其中的教训，对于我们这一代，甚至对于今后若干代，都是有意义的。

回顾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文艺活动，我们看见不但那些以艺术的笔触描绘这场战争、描绘战争时期的艰难岁月的优秀文学作品，仍然保持着艺术的生命力，正在跨越时空的阻隔，向幸运的后来者生动地讲述那一场充满屈辱与荣光的血与火的圣战。而且，我们还会发现，活动在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人们对于文学的深沉思考——在那个时代的土壤风霜中生长起来的

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却采取了与文学作品不同的途径通向战后的年代。如果说当年的文学作品是凭借艺术的绵远悠长的生命力，以它们本来的样子，生存在异代读者的文艺鉴赏中；或者作为文学史的参考资料，以它们本来的样子，直陈于研究者的书斋案头。那么，四十年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除了具有史料的价值而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文学史家们所珍惜的第一手材料外，它同时又销解了自己本来的存在形态，潜踪匿迹地溶入了五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之中。它已经成为构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个性的一个元素，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底色中的一个原色，而不仅仅是以历史资料的形态存在着。正如不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演变，不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就不足以透彻地把握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一样，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就不足以透彻地把握建国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特征，也无助于在八十一——九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我们尊重历史的客观性质，但不是“为历史而历史”，我们是为了今天、为了明天才去研究昨天的。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重新进行深入的系统的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文学理论是被非常的时空条件，置放于特殊的历史位置上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思考。特定时代的文学理论，既是文学理论在此前已经形成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与突破，是当代世界诸种文学思潮的交互影响在特定个体上的体现，又是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

与时代生活在文学领域的渗透与结晶。因此，不应当把它看成某几个学者在幽静的书斋里的苦思熟虑，而应当把它看作整个时代的文学沉思。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文学理论处于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自我与环境、期冀与可能、上升与堕落、生存与死亡的种种联系、转折、交流、摩擦、融汇、碰撞、渗透、冲突所结成的漩涡之中。它的特殊的处境、特殊的机遇，使它同前此、后此的文学理论的状况大相径庭。二三十年代，以上海、北平为活动中心的文学理论所处的境况，当然同它大不相同。它的生存状况又显然迥异于五十年代后的文学理论的情况。独特的处境铸成了独特的性格，独特的性格导致了特定的行动。这些行动所激起的社会反响，作为一种反馈，又刺激了它性格的某些侧面，使之获得较另外一些侧面更为突出的（甚至是不合比例的）发展，凝成了它的特定的容貌。

对中国新文学的走向作纵向的观察，人们理所当然地把战时大后方的文学理论看成“五四”文学理论的自然延伸，而不在乎特定历史条件对这一走向的规定性限制甚至是粗暴的扭曲。五四新文学运动崛起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已无力把握近代文学实践所造成的理论思考的空白之中。从它崛起的第一天起，人们就强烈地感受到了它所独具的前无古人的清醒的怀疑主义和英气逼人的批判精神。在“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呼声中，它登高四顾，目光远射，对世界各国的文化思潮与文学理论，采取开放的态度，勇敢地冲决思想网罗，摆脱理论陈套。它反传统，反权威，兴致盎然地尝试着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宽容地让各种各样的文艺思潮都有机会在文学领域一展身手，在这红橙黄绿青蓝紫的七色火焰中，锻造着自己的反帝反封建的思

想武器。它义愤填膺地斥责贵族文学、山林文学、庙堂文学，如弃敝履地抛弃瞒和骗的文学，强烈地要求文学写出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人性，真实的情感，真实的心声。它的旗帜是鲜明的，它对创作和文学思潮的态度是宽容的。条条小溪汇成滚滚巨流，几股水流互相摩擦着、碰撞着而又大体朝着一致的方向混流并进。但是，战争，“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都被裹挟其中的全面抗日战争，却使中国从政治、军事、经济到文化、教育、文学，从神州大陆的外貌到各阶层人士的心灵，都感受到了剧烈的震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切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继续下去了，即便是继续着战前未竟的事业，但也只能在新的形势中进行。战时大后方文学理论当然是五四文学探索的继续，但却不是在相同条件下的自然延伸，而是在非常条件下的扭曲成长。战争迫使它去思考、强调战争形势向文学提出的诸种问题，迫使它从某一特定的角度去观察、认识文学问题，正如全面抗日战争没有也不可能取消或结束中国的反封建任务，但战争却以压倒一切呼喊的高昂刺耳的声音，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赶走侵略者、还我河山、光复中华的问题，人们不得不更多地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一切、思考一切。在抗战初期，人们往往更注意强调抗战文艺运动与五四文学运动的血缘关系，而往往易于忽略二者的区别。在稍后一段时间里，随着战时文学创作艺术水准的提高，随着文学运动阶段性特点日趋明显，人们就开始意识到注意二者的区别的必要性了。罗荪写于1939年底、发表于1940年初的《抗战文艺运动鸟瞰》，将五四以来迄至于当时的文学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文学革命的启蒙运动。这是从五四时代开始的最初十年间的第一个阶

阶段。……二、革命文学运动。这是从‘五卅’时代起始，经过1927年大革命的实际战斗生活培养，及其以后的十年间的第二个阶段。……三、民族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这是自九·一八开始，到华北事变更更为具体化的直到目前的一个文学运动的新阶段”。^①这种分期法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这里透露出来的却正是当时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4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把抗战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来加以研究时，把握新文学运动全过程的一贯性与抗战文学这一特定阶段的特殊性，认识前者透过后者得到的表现，认识后者对前者的展开与变化，就更是必要的了。

自从人类历史跨入近代以来，一个民族自我封闭，断绝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孤立于世界其他民族的发展变化之外的状况，就越来越不能存在了。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发展，也就越来越离不开同民族外部的文学的交流、融汇。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五四新文学运动已经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学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中独自向前发展的进程，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不得不趋

^①原载《文学月报》第1卷第1期。

^②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于中断。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一次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多元的交流、碰撞，或彼此冲突，或相互依存。每一个个体都被置于整体的变动大趋势之中。这次战争把整个人类的命运拧到了一起，把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思虑与感情，凝聚到了同一个焦点上。各民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考也因之而有了更为密切的交流，产生了更为迅捷更为显著的相互影响。在这一点上，战时大后方的文学同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同散布敌后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文学，同沦陷区的文学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大后方的实际统治者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是从属于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系列的，欧美文学作品与文学思潮在大后方文学活动中的存在是很少受到阻碍的。在国共合作的政治形势下，在中国共产党和进步文艺界人士的有力斗争下，并且出于争取苏联援助的考虑，国民党当局也不可能完全禁绝得了苏联社会主义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俄罗斯文学和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这些来自东方和西方，来自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基督教哲学、弗洛伊德主义的文学理论、文学思潮，在大后方文学界的理论思维中，发挥着性质不同的作用，引发着、推进着文学观念的蜕变、突进、摩擦与抵牾，使得大后方的文学批评与理论思维，在战时相对狭窄、严峻的思维空间，显现出一种五色杂陈、五音交汇的生动局面。在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范围内，大后方文学理论思维所获得的这种可能，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欧阳凡海在谈到1940年的文学创作“颇多浪漫的传奇性”时，就曾明确地申说他从战时大后方文学创作中所获得的这种感受：“说明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仍然

站在世界文化的全体系中，作为民族的文学形式之一，在不断的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①秦牧在1943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新文学运动初期对于日本文学、泰戈尔、尼采诸人的介绍，很快的使小说领域受到影响，年来俄国作家、法国作家系统的移译，受影响既深甚速的也莫若小说……而且翻译风正盛（巴尔扎克、易卜生全译的进行和译文刊物的滋长是一个例子）……”鉴于此，他认定：“时代、理论和翻译可以说是刺激新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加速前进的三大要素”。^②1945年3月，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茅盾曾发表长文回顾《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他开列了长长的但仍然是不完备的书目，系统地检阅了战时对世界文学古典名著、苏联文学、英美文学、欧洲反法西斯文学的翻译工作。战时的文学翻译工作，按照茅盾的说法，从“七七”抗战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止的前期，侧重于苏联战前作品和世界古典文学名著的译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迄至当时的后期，则除继续前期的工作外，还注意了广泛介绍英美、欧洲的反法西斯文学。经过战争时期几年的努力，“从古典文学直到当代的战争文学，从古代希腊直到今天流离失所还没有自己的祖国的犹太民族、史诗、戏剧、诗、小说，我们的翻译文库真可以说一句琳琅满目”。^③这对于处在新的发展阶段上的新文学，意义自然是“非常重大”的。

大后方抗战文学是在外部和内部的文学交流、融汇中生成

①《1940年上半年文学创作的一般倾向》，原载《文艺评论》，当今出版社1943年版。

②《论小说创作》原载《文学评论》创刊号。

③原载《文哨》第1卷第1期。

和发展的，文学创作是如此，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也同样是如此。在外部交流这个层面上，我们看到了大后方战时文学与英美文学的交流，与苏联文学的交流，与欧洲文学的交流，与亚洲文学的交流。其中对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是与苏联及英美文学的交流。在内部交流这个层面上，我们看到了大后方抗战文学同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的交流，同香港文学的交流，同上海孤岛文学的交流。其中对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而又深刻的影响的，当然是同解放区文学的交流。在全国解放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茅盾作了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报告。他在报告的第一部分《绪论》中，在指出“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解放区的文艺运动所处的环境，不待说是有显著的区别的”之后，紧接着强调指出：“从斗争的总目标上看，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是一致的；从文艺思想发展的道路上看，双方在基本上也是一致的，而就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的主流来说，最近八年来也是遵循着毛主席的方向而前进，企图同人民靠拢的。”他所说的“最近八年”，当是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的七八年。但无论从抗战8年间大后方的文学实况，还是包括解放战争的3年在内，除开“斗争的总目标”的一致外，就“文艺思想发展的道路”而言，事情却并不像他所说的这么单纯、一致。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迥然不同的解放区与国统区，并立共存于中华大地之上。它们在中国人民面前形象地展现了两种方向、两种选择，孰优孰劣，何去何从，在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地区里的广大进步的正直的文艺工作者心中，是早就有数的。生活在专制、腐败的国民

党统治区域，一切进步的正直的文艺工作者不能不从精神上感到窒息，感到绝望，他们自然会把期望的目光射向西北的那片圣地。在这一方面，茅盾在上述报告中所作的下述论断显然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军民大众的伟大力量，始终成为鼓舞国统区一切文艺工作者加强其信心的基本动力”。但是，政治倾向的一致并不能自然导致文学观念的认同。虽然当时许多文学工作者是抱着虔诚的信心与真挚的尊崇之情，试图把从延安传来的一切文艺主张都毫无保留地接受下来。但是，文化背景的差异，文化素养的不同，思想视野宽窄的悬殊，思维方式的不同构成，使他们同当时生活在延安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思想的发展上，仍然存在着许多的甚至是重要的区别。这酿成了抗战后期的一些争论，更酿成了全国解放后的一些文坛灾难。茅盾在上述报告的第三部分《文艺思想理论的发展》中，虽然也简略地指出了“国统区的文艺界”“对‘文艺讲话’的深入研究是不够的”，并指出“有的”人是草率地或者不正确地对待这篇“文艺讲话”的。他是把这当作少数人的一种不正确不健康的文艺思想倾向来谈论的。但事实上，两种不同地区在文学观念、文学批评理论体系上的种种差异，乃至由此而引起的摩擦、冲撞，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也应当被视为正常的现象。只是后来采取文学以外的方法去统一观念、压抑争论，那才是不正常的现象。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生成史中这一段特殊的经历，对于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的重整与建设，是能提供耐人寻味的丰富的经验教训的。

在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的推动下，在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民主的激烈斗争中，在已经出现的机械唯物主义与庸俗社会学造

成的困惑与苦闷中，在不同文艺观念、文艺思潮情不自禁而且往往是意气用事的争吵中，总而言之，在历史与现实，在符合文艺规律的运行与违背客观规律的扭曲，在内部与外部交流等诸多因素的交错重叠之中，大后方抗战文学理论被摆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上。它是关于文学自身的思考，又常常是越出文学领域的哲学论争、社会意识讨论，乃至政治性很强的社会批判。它是人文主义的启蒙，反封建的呐喊，又在竭力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试图在中国文学的土壤上确立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文学理论体系。它视野开阔，雄心勃勃，大包大揽地承担了艺术本体论、创作论、文艺心理学、文体研究等等任务，但战火纷飞，镣铐沉重，内耗日甚，又不得不呈现出力不从心的姿态。它试图为文学创作拓开广阔的天地，开发多种多样的可能，但又常常以高涨的政治热情要求各种各样的文学创作都向同一文学思潮认同。它毫不隐讳自己的政治倾向，旗帜鲜明地要求文学为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服务，但它又常常为久治不愈的概念化公式化顽症而感到苦恼。这是一个充满深刻矛盾与剧烈冲突的时代，这是一种充满了深刻矛盾与剧烈冲突的文学理论，是一部包罗广泛，论题众多，但仅仅写下了提纲，还没有来得及展开，距完成就还更早的文学理论巨著。它永远也不能自己来完成它了。后来的历史进程已经表明，被完成的是另外一部著作。但是，今天来翻阅残简，它曾经涉及的许多问题，它曾经提出的某些论点，虽然远非明确、完整，但仍然可以令人感受到当时文学界一颗颗心的激烈跳动，仍然会使人深信它不但作为历史资料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而且对于今天和明天的文学理论建设，仍然有着启示的意义。

上 编

